



新常态下铜陵经济 转型与发展研究

◎ 周正平 夏美武/著

XINCHANGTAIXIA TONGLING
JINGJI ZHUANXING YU FAZHANYANJIU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新常态下铜陵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周正平 夏美武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常态下铜陵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 周正平, 夏美武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 - 7 - 5141 - 7939 - 2

I. ①新… II. ①周… ②…夏 III. ①转型经济 - 研究 - 铜陵
IV. ①F127. 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1523 号

责任编辑：白留杰 刘殿和

责任校对：徐领柱

责任印制：李 鹏

新常态下铜陵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周正平 夏美武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010 - 88191345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箱：bailiujie518@126.com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e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1.75 印张 200000 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939 - 2 定价：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序 言

铜陵市曾经是我国铜资源的重要战略保障基地，为国家铜工业平稳较快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资源日趋枯竭，转型发展对铜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09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试点城市之后，铜陵市坚持把城市转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建设幸福铜陵结合起来，确立了“四转一解决”（即观念转新、经济转型、体制转轨、环境转优、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转型战略，在国家和福建省的大力支持下，铜陵开始了全面转型的实践，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铜陵实际、具有铜陵特色的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之路。8年来，铜陵市的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成为全国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循环经济创新示范市、国家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市、连续3年获评全国资源枯竭城市绩效评估优秀等。但在经济新常态下，铜陵仍面临着经济运行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力不强，经济转型缺乏重大项目支撑，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压力和挑战，铜陵的转型发展仍有必要进行深层次研究和探索。铜陵学院周正平、夏美武两位教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为理念，打造“四个富有”新铜陵为目标，对新常态下铜陵的经济转型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可谓应运而生，非常及时。

本书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重点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这些理论对于指导铜陵转型发展和实践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本书紧扣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主题，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方向和转型的动力机制，为铜陵的转型注入了时代发展的要素；再次，本书在分析SWOT模型的基础上，分别从路径演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格局演变、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改善和企业发展能力提升等

方面为视角，围绕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动力转换等核心内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最后，本书附加了铜陵企业转型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例是建立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之上，对于微观主体的转型升级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由上可知，探索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有利于铜陵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适应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选择一条适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路径和模式，使铜陵沿着“开发兴起—建设成长—繁荣稳定—产业转型—可持续”的正确轨迹发展；本书的许多政策和建议，为铜陵市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人才政策，以及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平心而论，铜陵作为一座资源型的工业城市，许多领域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也很容易成为经验和模式探索的典范。正因为如此，铜陵的循环经济模式、均衡教育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社区管理模式和城市转型模式等经常出现于报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铜陵模式的研究，具有生命力，能够体现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征程中积极探索的价值。

总体来看，这本著作有以下特色：第一，强调发展转型。铜陵作为资源型城市，虽然面临社会负担重、环境污染大、城市建设欠账多等一系列问题，但发展就是最大的转型。在面向信息化、国际化的新常态下，以科技、人才、品牌、服务驱动为抓手，坚持走城市产业发展的绿化之路、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化之路、产业结构的优化之路、产业园区布局的集群化，是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经济转型发展，促进了就业和繁荣，历史遗留问题也将得到顺利解决。第二，突出科技与人才转型。科技是转型发展的根基，人才是转型发展的保障。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资源依赖型的发展已无路可走，必须寻求新的要素来发展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创造价值的增值。科技与人才是信息化和国际化趋势下最重要的发展要素，也是各个地区促进发展的主要努力目标，本书始终突出创新、科技和人才，就是寄希望这些有竞争力的要素在铜陵的转型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第三，寻求特色转型。铜陵以铜兴市，铜工业是主要优势产业，聚焦优势，寻求特色定位是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倪玉平市长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研讨班上指出：“抓住铜、延伸铜”，在提升铜业发展水平上用力。本书无论是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成长，还是产业园区的集聚，都紧扣“抓住

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的发展思路。第四，坚持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效、和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以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城市为重点，这是铜陵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在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的重要途径。第五，优化空间发展转型。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国土面积狭小、分散，经济体量不大的铜陵，应当优化空间发展格局，开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本书在对接合肥都市圈、打造长江经济带特色节点城市、构筑皖西南经济圈和推动工业园区的产业集群重构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伴随着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和工业制造 4.0 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常态下的铜陵转型，必须更多地从产业发展规律、服务优化出发，更多地强调人才、合作和创新，更多地谋求产业内部的发展动力、市场体制的发展动力和组织环境的发展动力，打造富有实力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城市、富有魅力的山水园林城市、富有向心力的人民满意城市，通过坚持坚持再坚持的努力，使这座城市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光彩。在铜陵转型发展的新征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环节是加强对转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的研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描绘美好的丽景，为铜陵的转型发展提供思想动力源泉。周正平、夏美武两位教授，不顾工作繁忙，能够静心探索新常态下铜陵经济的转型发展，实属难能可贵。衷心期待他们再接再厉，继续拓展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为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冯德连

2017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	(1)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相关概念	(1)
第二节 资源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3)
第三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与原则	(12)
第二章 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转型	(15)
第一节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及特征	(15)
第二节 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	(17)
第三节 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	(20)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铜陵转型的动因分析	(28)
第一节 铜陵转型的主要成绩	(28)
第二节 铜陵转型面临的问题与制约要素	(33)
第三节 铜陵资源型城市转型的 SWOT 分析	(38)
第四章 发展路径演进视角的转型	(44)
第一节 积极打造驱动城市转型的“四轮”	(44)
第二节 坚持发展“四化”之路	(48)
第三节 认准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	(55)
第五章 科技创新驱动视角的转型	(59)
第一节 科技创新引领铜陵转型	(59)
第二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铜陵转型	(65)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视角的转型	(73)
第一节 高端制造业发展与铜陵转型	(73)
第二节 现代服务业发展与铜陵转型	(91)
第三节 产业集群整合规划与铜陵转型	(100)
第七章 区域发展空间优化视角的转型	(111)
第一节 寻求有利的区域竞争格局原因	(112)
第二节 积极对接合肥都市圈	(115)
第三节 建设长江经济带特色节点城市	(118)
第四节 打造皖西南经济圈	(121)
第八章 发展循环经济视角的转型	(124)
第一节 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及其制约因素	(124)
第二节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	(127)
第三节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转型发展的保障措施	(132)
第九章 生态环境改善视角下铜陵的转型发展	(135)
第一节 铜陵市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35)
第二节 铜陵市生态环境难以改善的主要原因	(137)
第三节 西方发达国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启示与借鉴	(139)
第四节 改善铜陵市生态环境的对策	(140)
第十章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视角的转型发展	(148)
第一节 铜陵市建投公司的战略转型与发展	(148)
第二节 民间投资提升视角的铜陵转型	(155)
附 铜陵企业转型的主要案例	(165)
参考文献	(172)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相关概念

一、资源型产业

资源是指可被人类开发利用的一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够给人类带来赖以生存的财富。狭义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如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动物和矿藏等。广义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社会的人文资源。社会人文资源是人类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主要利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进入 21 世纪，知识和智力等资源，越来越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资源型产业目前使用较为广泛，但尚未被明确界定。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资源型产业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基础而形成的产业，自然资源是其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陆大道（1995）将资源型产业界定为以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的产业，但这一定义未考虑到国内外通用的产业分类。张米尔（2002）认为，初级加工的内涵和外延无法界定，基于国际标准和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资源型产业定义为从事不可再生资源开发的产业，包括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的第二大项矿业和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 B 类采矿业。本书认同张米尔的概念界定，即资源型产业是从事不可再生资源开发的产业。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需要实现与科技、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重组，推动资源型产业的升级发展。铜陵市是一座以矿山开发、粗铜冶炼为发端的资源型工矿城市，长期以来，形成了“二高一低”重工业体系，随着铜矿等资源日趋枯竭，转型任务

愈加繁重。

二、资源型经济

学界关于资源型经济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可耗竭资源，形成了以资源开采和资源初级加工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中，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被自然资源相关产业所占据或排挤，经济发展的有利要素得不到重视，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投入如服务业、科技创新，则相对匮乏。资源型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是建立在高度依赖的可耗竭资源之上，经济结构一般能够围绕该资源形成产业关联度大、产业链不断延伸，分布较为密集的产业集群。但由于自然资源的可耗竭性和有限性，随着资源的不断减少和枯竭，长期单一的、资源依赖型的产业结构往往面临既缺乏替代产业，又缺少资本积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一旦资源枯竭，除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之外，资源型经济还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使社会支付更多的“沉淀成本”。例如，矿区的开采造成塌陷区的面积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部分资源初级加工业也会产生大量粉尘、烟气和废水等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可见，资源型经济会导致两大内生性缺陷。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主导产业单一化。由于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和依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主导产业的单一化和产品处于初级加工阶段。二是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可供开采资源的减少和开采难度的增大，资源型企业下岗分流、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资源依赖型地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因此，有必要将资源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早日提上日程，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改变资源枯竭、城市衰落的窘境。

新常态下，长期对人才、技术资源的漠视，对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忽略，已不足取；加快发展观念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才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主要选择方向。

三、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资源型城市主要指伴随自然资源的不断开采而发展起来的，并且与资源相关的产业在工业中比重较大的城市。对资源型城市研究，英国的奥隆索（Auronsseau）在1921年首先提出了矿业城镇（miningtown）的概念，此后，美国

学者纳尔逊（H. J. Nelson）和哈里斯（C. D. Harris）等都对资源型城市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专业名词。目前，对资源型城市最新的解释主要依据国家《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它指出资源型城市是以所在地的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采掘、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一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内涵：第一，可耗竭或近似可耗竭的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是资源型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但随着资源经过多年开发或过度开发，许多地区已进入资源枯竭期或濒临枯竭期，并且由于技术或开采成本过高的限制，许多地方已不具备进一步开采资源的条件。第二，资源型城市以一个或几个资源型企业为主，发展往往局限于资源开采、初级加工等，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经济缺乏增长潜力且呈逐步衰退的态势。第三，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从事资源开采业、资源的初级加工业及相关产业，由于国企效益不高、资源枯竭导致企业关破，资源型城市失业人口比重较大。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依赖其资源禀赋，但经过多年开采，资源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单一、三次产业结构构成不合理的局面，资源条件恶化。从资源型城市发展和产业演进规律来看，需要通过产业链延伸、新型产业植入和新主导产业扶持等方式，帮助资源型城市摆脱单一资源型产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优化产业结构，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实现城市的持续发展。本书认为，产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撑，是在科学评估城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支撑、制度环境等条件的基础上，科学定位城市产业发展目标和科学选择主导产业，并合理安排各阶段的产业结构，深入设计产业发展的路径，通过多种手段加以引导和规划，推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体系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

第二节 资源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物品和劳务生产总量的增加，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变化，衡量经济增长的优先标准是实际人均GDP的增加。美国经济学家S. 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经典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

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应受以下条件制约：（1）体制约束。体制规定了劳动方式、管理模式、物质和商品流通、收入分配等内容，规定了人们经济行为的边界。（2）资源约束。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素质、资本数额等方面。（3）技术约束。主要指与科技相关，其技术水平直接影响生产效率。

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可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古典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是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使劳动者人数增加，资本积累和企业家的组织管理活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索洛（Solow）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他认为产出（Y）是资本（K）、劳动（L）及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三个变量的函数。索洛的增长模型在假定规模收益不变、运用“索洛余值”解释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但它无法解释技术进步本身的不断加快，以及先进国家经济发展加速，而落后国家发展相对迟缓等问题。罗默（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是来源于外部因素，而是由经济有机体内部因素引起的。罗默在其《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一文中指出，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对它本身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生产中具有递增报酬。另外，知识还具有外在性，即一个企业创造的知识会使其他企业受益。在罗默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将人口、资本流动、政府政策、国际间商品及技术转让等将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模型，经济体由自身的投入研发的资本，劳动力的经验积累以及技术的存量共同决定。在这种机制下，人力资源通过“干中学”成长为人力资本，从而使一个区域的经济获得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区域经济在新要素的促进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资源开采之初，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相对丰裕，资源开采的成本低，资源开采市场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资源开采者往往通过“跑马占荒”的开发方式将资源转化成财富，强者生存是资源型产业的基本生存规律。但是，随着资源数量减少，资源开采成本的逐步上升，迫使资源开采者改变原有的粗放型经营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开采率。这是一种新的经

济增长模式，产业发展进入了集约型、内涵式的经济增长阶段。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不仅指产出的增加还包括产出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投入结构）的优化，后者则是产出（总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加。前者更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关系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经济发展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又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此外，经济发展还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以及居民劳动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

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产业生命周期是指从产业开始出现进入市场到完全退出经济活动所经历的过程，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识别产业生命周期处于哪个阶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市场增长性、需求增长率、产品品种、竞争者数量、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技术变革、用户购买行为等。第一个阶段是产业的形成期，某类产品所具有的潜在需求逐步受到市场的认可，转化成为现实需求。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可能十分迅速，也可能非常缓慢。但当产业的产出在产业体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时，产业发展进入成长期。产业在成长期发展非常迅速，产出比重提高很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且趋于成熟，市场需求迅速扩大，产业发展曲线表现的斜率也比较大。在经过成长期的迅速成长阶段之后，产业发展速度将放缓。这主要是因为产品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产业在产业系统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产业进入了成熟期，产业发展曲线的斜率趋于平缓。在市场上，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新的具有替代性的新产业出现，原有的旧产业逐步萎缩，退出市场，产业进入全面的衰退期，衰退期的产业发展曲线斜率常常为负。

不论何种产业都必然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这四个阶段，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生命周期的长短和技术创新带来的生命延长。资源型产业围绕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了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为社会提供须臾不可离开的资源产品，因此资源型产业在短时期内不会消亡。但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资源型产业必然随着资源耗竭、产业生命枯竭而走向衰亡。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揭示资源型城市必须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促进可持续发展，以摆脱产业生命周期规律的束缚。如上所述，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既受到产品生命周期规律的

支配，也面临资源耗竭的约束。一个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产业的增长必然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趋向衰亡。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产业的形成和成长、消亡的历史规律，提出了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必要性。

（二）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的内涵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研究产业组织时，产业是指生产同类或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而在研究产业结构的时候，产业是指使用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艺技术或生产产品用途相同的企业企业集合。为了产业活动管理和研究的方便，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进行了分类。这些不同的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形成了产业结构。事实上，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同其他任何客观事物一样处在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当中。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质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而，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和主导产业选择理论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早在 17 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开始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他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各国经济差异与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配第认为，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将推动劳动力从低收入的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 C.）在配第的研究基础上，根据三次产业论专家费希尔的划分，开创性地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当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时，劳动力也将发生转移，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Kuznets S.）对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系统研究证明了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他指出：伴随现代经济增长，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比重将下降，工业比重上升。在工业内部明显存在由非耐用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由消费资料生产向生产资料生产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并且下降的速度低于农产品比重下降的速度。工业劳动力有所增加，但工业劳动力增长率低于工业生产增长率，在工业内部，各产业的雇佣率与增加值同时增长，采掘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中商业比重上升，生产技术的变化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指出了可能性。城市作为一个区域，其经济体内必然包括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产业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城市的经济发展除增长之外，还应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优化过程也不能

脱离产业结构演变理论解释的规律，其演变方向必须在这个规律的指引下发生和发展。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时，也需要有产业结构演变理论进行方向性指导。铜陵要以本地区的实情与替代产业的选择基准相结合，积极利用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为产业转型提供指导。

三、资源诅咒学说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 资源诅咒学说

资源诅咒学说是经济学的著名命题。奥蒂（Auty, 1993）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 和 Warner（1995, 1997, 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资源诅咒是发生在资源丰裕地区的一种悖论现象，由于资源丰裕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于比较优势原理，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对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视不够，导致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经济增长乏力，引发“资源诅咒”。所谓“资源诅咒”是指从长期的增长状况来看，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许多；尽管资源丰裕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羸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

对于资源丰裕国家或区域而言，面临骤然来临的资源繁荣和资源财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预备和有效监督，使得其他生产要素沦为资源的附庸。原有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形成了以资源开发为动力、以资源财富为主导的新的发展平衡。资源型经济现象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看，就是资源产权及交易制度、资源开发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的严重缺失，使资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宰性力量，恶化了贸易条件和产业发展生态，扭曲了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与配置方式，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导致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制度规范和治理约束是防范资源优势肆虐的最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大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已陷入“资源诅咒”陷阱，自然资源丰度与经济发展出现负相关。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资源未枯竭型城市也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下降的趋势，亟待转型。从本质上来看，转型关键是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资源的依赖，跳出“资源诅咒”陷阱。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事业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10年后，著名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的《只有一个地球》问世，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协调一致，让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建立在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内涵：一是公平性，公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同代的公平和代际之间的公平，这是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二是持续性，即为了使有限的资源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人们应在合理范围内明确自身可消耗的资源储量，以实现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三是共同性，即可持续发展不是某个个体的目标，而是全球各国人民都要方向一致，完成的共同目标。我国于1996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至此，可持续发展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之一。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从资源方面来看，要求城市不断追求其内在的自然潜力得以实现，合理地利用城市所拥有的资源，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利用效率问题，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环境方面来看，要求公众不断努力改善自身社区及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利用环境生态规律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使人们生活在生态优美的环境之中；从经济方面来看，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大力开发新的产业群体，实现资源消耗最小、经济收益最大化，保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市经济仍然能够健康地发展；从社会方面来看，追求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充分就业与社会更加和谐。资源型城市是因为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兴起或发展壮大的，经济结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目前，资源型城市的重

点产业多数是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资源型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也多是环环相扣，“链条式”的发展模式一度为地区经济振兴发挥积极作用。但随着资源的日益消耗，一旦发生资源耗竭危机，各产业也必将以“集群”的方式出现集体萧条，不仅会造成经济危机、失业严重、社会混乱等严重后果，也可能进一步引发生态环境危机。所以，推动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和转型升级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即突破对现有的可耗竭资源的高度依赖，将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由过去的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领域转向深加工或其他产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四、创新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

(一) 创新理论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熊彼特最先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揭示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同时，阐述了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并就创新实现的条件、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创新理论强调要用动态角度分析问题，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而创新是要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产品打进新市场；开辟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建立企业的新组织”等五个方面。继熊彼特之后，创新理论中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得到了持续发展。技术创新论强调技术的变革与推广，制度创新论则强调制度的变革与推进。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的本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它需要改变旧的产业，衍生新的产业体系，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